

## 楊序

言近世戰史者，斷代於拿破崙，近代兵學亦以拿翁戰史之研究肇其初基。拿翁用兵之神，武功之盛，遠邁前人，顧於戰爭原則之理論說明，則初無體系，是亦猶大藝術家於著筆之際，原無規矩準繩存乎其心，故亦未能以體系完整之學說傳其心法也。拿翁歿後，西洋對兵學之系統研究始漸盛，論者輩出，其尤著者，曰蕭米尼，曰克勞塞維慈。蕭米尼以瑞士籍軍官曾充法軍參謀，於拿翁作戰之方法領悟特深，著有革命戰爭批判史，戰術論等書，其對內線作戰之闡揚，支配西洋兵學思想幾達一世紀之久；惟蕭米尼之立論純出發於幾何學的歸納與演繹，重形式而忽於精神，是其弱點。與蕭米尼相反而相成者，則為普魯士之克勞塞維慈。

克勞塞維慈生當拿翁之時代，且一度為法軍所俘，羈法京三載，其對拿破崙戰爭之特質，觀察當甚深刻，而克氏復秉哲學家之氣質，承其本國哲學名宿康德，裴希特，黑格爾諸氏之餘緒，治學方法慎密謹嚴，宜其學說博大精深，體系井然也。

克氏戰爭論之主要命題，約而言之，不外三者：一曰，政治目的為戰爭之本原動機，故戰爭實為政治之手段，政治活動之繼續（戰爭之政治內容）；一曰，戰爭所用暴力有敵我間相互之作用，故暴力之發揮以達極限為理想（戰略之獨立發展）；一曰，精神力為遂行戰爭之要素，僅據物質現象立說則理論必與實際相違。凡此命題皆為拿破崙時代現實背景之產物，固不待言；拿翁一生成敗，當時法蘭西之政治新生，西班牙之游擊戰以及普魯士之民軍均與克氏以甚深印象，亦意中事，克氏於其書中已屢言之矣。拿翁以本能之直覺，運用極限暴力原則，故得成其殲滅戰與速決戰之大功；善用士氣，故能克服諸多危難，行動敏速；惟自一八一二年之役以後，戰功之赫赫如故，而政治目的之達成則鮮，終以覆敗。拿翁以直覺所行之於實踐者，克氏則以哲學規之為學理，於是有戰爭論之作。普魯士軍人讀克氏書，試用之於一八七零年之戰，賴政略戰略之協調，極限暴力原則之運用，果奏捷於色當，盡雪前恥。克氏之學說行，德意志黷武主義之思想遂亦因克氏極限暴力說之刺激，而漸猖獗矣。

然而克氏戰爭學說之精義，主在說明戰爭之政治內容，固非以暴力之極限使用為目的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於協約國家，政略上之原因居多。魯登道夫於戰爭後期以幕僚首長負戰爭指導之主責，其對政略與戰略之不盡配合引為痛心，事屬固然，第政略與戰略不盡配合之原因，果否必當歸咎於克氏戰爭學說之政治命題，則誠為疑問。戰爭爆發當時，德國參謀總長小毛奇之以動員計劃已定，無可更易為辭，致令德國不得不冒兩面作戰之危險，是其戰略早經獨立發展，控制政略，勝敗之數固無待於美國之參戰與否也。魯登道夫以第一次大戰之經驗著為全體性戰爭論，為本次大戰軸心國家之精神的作戰指導，就政治目的、極限暴力以及精神要素諸原則言，全體性戰爭論實仍祖述克氏，然必欲以政略屈

從戰略，發揮黷武主義之精神至於極限，則本次大戰德日兩大軍國之崩潰，可以為鑑矣。

克氏為學，以理論與現實並重，合哲學的思索與戰史之研究為統一的發展，其方法論之正確，即在百年後之今日亦具無可否定之價值。克氏之言曰：『戰爭發原於社會諸條件及其相互間之關係，故亦受此等條件之支配，』其對戰爭之動的本質，殆已說明無遺；然則其戰爭理論亦當依時代關係而為動的統一，實為當然。百餘年來科學技術之進步，克氏固不及見，即社會條件與政治理想之改觀，亦頗非普魯士精神萌芽時代之克氏所可豫知；故現代戰爭之指導應如何依從新的社會條件以求新的政治理想之實現，是亦非克氏所可得而言者。日本成田賴武取克氏之書，汰其陳舊，刪其繁冗，期合於時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擯棄克氏之方法論於不顧，而徒以克氏之若干命題，視為黷武主義經典，是則重違吾人研究克氏之本意矣。

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孫子，蜚聲論壇，茲復譯成田氏之書，知余於克氏學說之介紹不無些微因緣，乞為之序，爰書所見如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中山 楊言昌